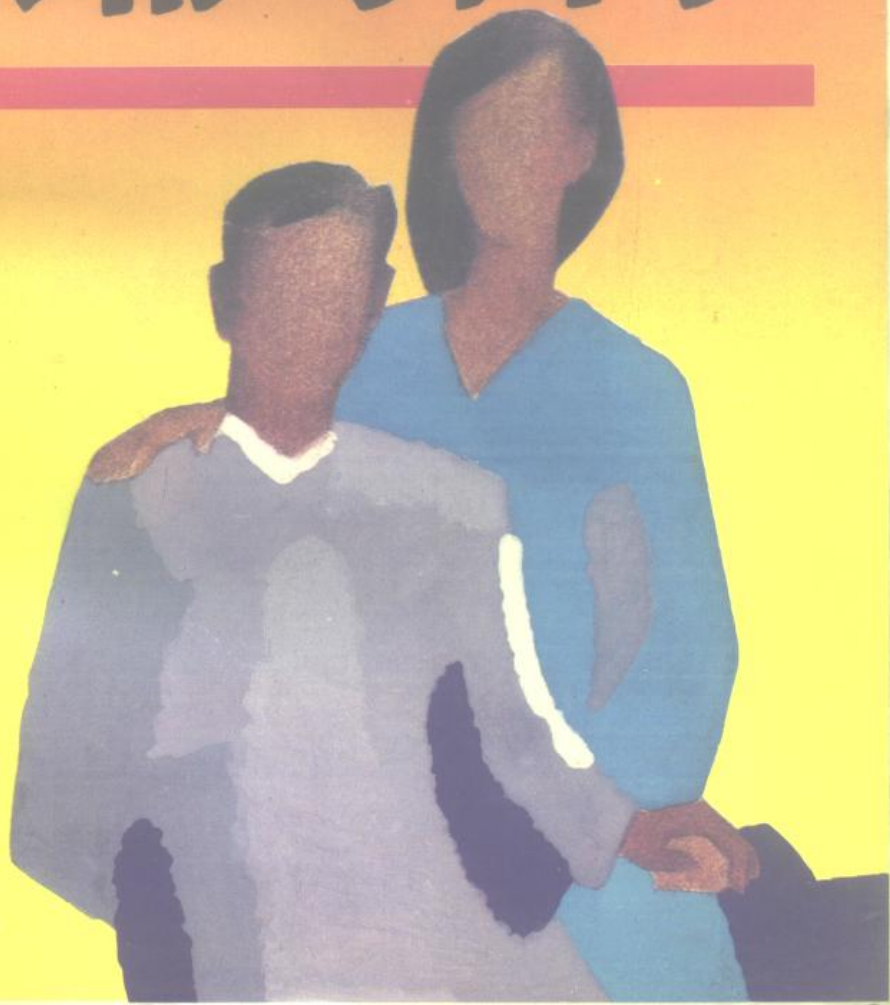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 人情与面子

(台湾) 张老师月刊编辑部 编



C912.3
13

中国人的 人情与面子

(台湾)张老师月刊编辑部 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京) 新登字 191 号

书名 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
编者 台湾 张老师月刊编辑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25 印张 106000 字
版次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1992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7-5057-0287-4 / G·16
定价 2.80 元

序

中国人心底的故事

余德慧

故事的缘起

近五年来，张老师月刊的编辑群努力地从我们中国人的“实相”找出可资分析中国人心理特性的线索，以做为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心理基础。

这个过程算不得艰辛，因为我们并未触及学术理论的深思熟虑，不过，这五年来也不是很轻松地走过，因为中国人是我们最熟悉的种族，中国人社会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环境。由于一切现象都是那么“自然”地发生，使得我们忽略了其应有的特性，如果我们的编辑们都有泛文化的经验，或许比较容易跳出中国人的熟悉圈子，用比较具有“西方”偏见的眼光来缕析中国人的行为，以求取相对的观点。

然而，泛文化经验并不是唯一了解自己熟悉文化的方法，单一文化心理的考察，并不是全然是单一的观点。由于台湾社会近年来的现代化趋势不断加速，都市居民很快地含摄各种次文化的向度，包括了办公室的现代思潮，与

根深抵固的传统家族主义，由任何一个单向度的观点来捕捉现代台湾社会人群的心理，显然都是相当不足的。例如，中国人不讲求个人权利义务的基质集体主义，或者以角色为自我认同的次质集体主义，都已经不足以说明变迁中的台湾社会。我们也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中国人的现代化性格固然是朝个人主义方向奔去，但也不可能是欧美个人主义的翻版。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发展，乃是适应环境变迁的自我认知的变迁，属于心理认知的自然蜕变，却不是为了创造一个与其他文化相类似的环境——那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而在这个处境之下，不少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次文化不断地成形，即使是传统文化，也以占一席之地的立足点与办公室文化、科技文化、企业文化并列，而不见得具有独尊的地位。因此，这个局势提供了单一文化分析的互相比较的基础，而提供了我们编辑群泛“次文化”的经验。

我们对中国人心理的基本立场是在于“强调中国社会本身的自主性与自生性”。中国文化的自主性来自于中国强势的传统所支撑中国人未来发展的主干。这个主干具有融摄变革的特性，也具有其较难被完全抹杀的“文化原型”，而中国文化的再生性则在于中国人自我的改革，并以外在环境为适应对象的有利变化。

这两个性质支配了我们的思路，对我们考察中国人的心理变迁有相当大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企图在不断变迁中的心理历程捕捉不太容易变化的“心理原型”，并企图看出它们到底直接或间接地支配了目前中国人行为的多少琐碎的行为，或者对一些简单的举止中得到有意义的诠释；一

方面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些与中国文化原型相冲击的基本概念，看看中国人如何在不满意自己的情况下，向自我的原始设基挑战。

这是相当有趣的思路。有时候我们会静想，这个时刻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是多么恰当的时候，这个文化象个蜕变中的巨兽，在时间的冠冕之下总是赋予自己一个不同的风貌，它不再象百年沉睡安详的老兽，某种力量不断汇集在它的体内，使它从睡眠惺忪中苏醒。我们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它改变了自我的风貌？我们能不能用一套比较完整的心理架构来说明它？在中国文化生活的子民又如何感受到文化巨兽的变迁？

讲它的故事可以有許多版本，可以从微细的部分开始讲起，也可以从最大的概念开始说。我们在这套丛书要说的，就是从比较细部的心理开始着手，然后碰触到一些巨视的概念。我们不希望追随文化心理的学者，先导出一个架构，而是优游地从实际的生活去累积观点，并且把这个活动当做终生的乐趣。

中国人的“颜面”、 “压抑”与“双面性格”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人对“颜面”的敏感，使面子成为中国人保护自我的甲冑。在我们的自我系统中，我们是“被人看的”，比较少的部分是“自己看自己”。在“被人看”的感觉中，我们对于真实的自我往往有一种好象“知道又不清楚”的模糊感。有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知道

自己有着某种需要，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无法很一致的表现出来。我们必须赋予我们的行为某种修饰，而此般的修饰又希望呼应外在的观感。至于最后的行为是否真正切合自我的需要，那已经不是顶重要了。

我们每个人多少对于真实自我的透露心存紧张，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设想一个人在众人中说自己的丑事，尴尬的可以不是说话的人，却是听的人。听话的人往往必须把自我投射到说话的人身上，并且设想自己的难堪。从这种情形来看，我们的自我往往须象甲壳内的软细之肉，太容易受伤害，太容易让自己感到羞辱。

我们也经常感到在顾及颜面之下，自我有着“理直气衰”的感觉，坚持自己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我们打算保护自己的理念甚薄，护卫他人观点的心思又是如此急切，以致我们的自我很容易曲折。当我们想为自我打算的时候，会想到“自私”的标签，而“自私”是集体主义的禁忌，我们无力打破它，却不知道“自私”与“自我”有相当的区别：在集体主义的心理意义下，“自私”与“自我”往往是同义之词，因为从他人的立场来看，每个人都要护卫他人（至少是自己小圈圈里的人），讲不得自我的权利；而在个人主义的心理意义之下，自我拥有相当明确的权利范围，与颜面无关，与照应不照应他人无关。而自私的意义则仅在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之下，才能显现其意义。显然，在颜面系统的笼罩之下，我们往往依循着集体主义的法则，让自我变得虚软无力。

同时，我们必须小心地压抑着自我，虽然我们的自我暗地里活跃着。怕说错话，怕穿衣服被讥笑，怕对待父母

的方式被讥为不孝，怕与权威说话，都显示出这种压抑的感觉。其中的关键是，面对着他人，我们吃不下“秤砣的心”，缺乏有系统的意念让我们独立自主。当我们做错事时，我们的眼神象只被责罚的小狗，怯生生地把眼皮垂下来，脸上有着乞求原谅的皱纹与肌肉。我们比较难以豁开来，问一声：“好吧，接下来又如何？”的认错与解决问题的态度。

由于颜面的存在，使中国人把他人的议论认为一股巨大而无法抵抗的压制系统。由于我们对当面的议论难以忍受，担心颜面挂不住，使我们必须转到背后进行谈论。而背后的议论使议论者的自我跃然出现，肆无忌惮地把人是人非做一番自我满足的诉说。在谈论中，很少人会问事实是什么，只是问我们的评价是什么，我们曾压抑着的心思是什么。背后的议论系统其实比较真实，只是真实中带着我们对他人的扭曲。我们仿佛也知道这种扭曲，益发使我们不敢当面对他人说起，而造成中国人的性格有着“表里不一”的双面性格。

双面性格的情形在我们的社会是一种合法的操作。任何人都能很快地意识到表面话与心底话的差异，也颇能预测何时我们必须处在何种状态之下。我们很少直接攻击说表面话的人，有时更是心存感激于他人的表面话，但是，在背后我们会讥笑说表面话的人。事实上，我们对双面性格的操作相当安适，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表面与真实中穿梭自如，并且积极地培养不同的群体，使我们在不同的群体中以不同的性格出现。

表面性格与我们对角色的认定有密切的关系。在集体主义的心理状态里，自我与角色并没有两样，两者都是扮

演出来给别人看的。我们在集体主义的熏陶之下，很容易把角色的自我与真实的自我相互混淆。这种现象，可以从中国人的个体行为看到，也可以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群体表现。至今，我们的评价思维中，很容易把文化的理想与真实混淆，我们的任何评论中，往往会把社会的理想当做真实，而把真实的行为视为难以接受的齜齜相对待。文化的理想可以化约成角色的自我，里头有整套成袭的理念，不考虑个人的差异与独特性的主张，否认个人或群体对角色的认同带有自决的选择权，也否认个人或群体的私欲与需求。这种“非人性”的角色自我并不是不好的，而是它可能只是外在的设计，应该容许个人象修改衣服一般地使其合身。我们的问题与困扰却是，文化是提供一种尺寸的衣服，要求穿它的人必须硬塞进去，或者打肿自己使之合身。

家庭依附、亲情与控制

家族主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根，对这个根，我们有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可讲。

家庭提供家人彼此无条件的支持是家族主义的基本设基，但是在支持之下，每个人又需接受控制，换句话说，中国人的支持与控制是一体两面的状态。

当父母提供子女任何教养费用之时，父母也意识到他们有完全控制子女的权利。我们经常看到父母不与子女讲求任何权利义务，也不认为子女在什么时候应该拥有何种权利。但这也意味着父母可以完全牺牲个人，以辛劳、苦劳来支持他们的子女。这是绝对的相互依附，并且将视为

不可改变的法则。即使子女长大成年，这种相互依附的关系依然不会有着根本的改变。

从我们的观察中，我们惊异地发现，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一直以“共合”的方式存在，绝对不允许“分离”的意识产生。西方人的“割断父母子女的心理脐带”不是中国人的传统，因为父母子女之间的分离意味着“亲子的撕裂”感，我们会悲伤地想到“反馈失败”的不孝感，“养育失败”的孽子感，以及家门不幸的羞辱感，里头总是血淋淋的一片。

我们在亲子和合的状态下，使父母对子女的操控成为合法的事实。父母可以理直气壮地用伤心、痛心的情绪逼使子女就范，也可以用无限的权力来支配子女事业、婚姻的选择。年轻的子女往往用双面性格来应付这种场面，他们从家庭中学习到如何隐藏自己的想法，并且如何减少父母的控制——办法是：阳奉阴违。

由于子女的隐藏性自我，使得中国家庭的亲子之间有着难以言喻的隔阂。当父母在行使他们无限的权力时，其权力的来源是不容许被挑战的。子女也知道，对父母的支配权力的怀疑，无疑是要揭掉彼此的“和合”假设，而使“分离”显现，并且会导致严重的家庭悲剧。

从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讲求父母子女的独立存在，只是一种“吃洋人牙慧”的思想，会引起我们“义和团”似的愤怒。既然“体制外的改革”不容易成立，父母子女往往必须在“体制内”做温和的修改。我们的文化中强调父慈子孝的双面呼应，并以“宽容”、“忍耐”做为父母、子女的守签。然而，在“宽容”与“忍耐”仍然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家庭之怨遂是成形。

“怨”是中国人对待最亲密的人时最容易产生的神经质情绪。“怨”并不是来自个人内心的心理失常，而是文化的设计使然。依附是“怨”最重要的成因，由于我们在最亲密的状态之下，总是愿意为对方牺牲，因而会有“为对方做太多事”的感觉，而在这种“做过头”的暗底里，强烈地潜存着对方相对应的期待，希望对方也一样的为自己“做过头”或牺牲，可是，这种期待往往在沟通不良或者不符合自己想象之下，产生了怨尤。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对子女的怨，妻子对丈夫的怨，女友对男友的怨，都有着类似的理念系统。

另一个无法消除的神经质感觉是“卑”。在我国的家庭教化中，相当强调地位的排比，“父尊子卑”与“男尊女卑”都有显而易见的行为可循，“你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的怒声是经常彻耳可闻。我们意识到的“卑”若是在公平竞争下的失败感，倒是比较容易处理，但若是来自整个文化的设计而使个人必须以“卑”的心情去对待无可竞争的长上，那种无所不在的感觉反而使我们无地可逃，因为这里头几乎没有太令人信服的理念存在，而仅仅是一种看不见的理念在背后操控着。“卑”的存在，其背后是相对应的“被爱护”、“被疼惜”的感觉，这是我们的长辈相当愿意提供的一种情怀，而“被爱”与“被疼惜”者的另一个心理层面则是被动的自我。低位者以被动的心情期待父母的关爱，就如同优柔的女性期待被爱的娇羞。低位者的被动性自我，不但不会被长上斥责，反而觉得“恰如其分”，就如同长上者“适如其分”地提供爱与关怀。我们注意到这里头的交流是相当不平等的，谈不上“相互性”，反而有着“黄盖被周瑜打”的“卑喜交加之感”。

事实上，这往往是中国人有着“被陷在里头”感觉的基本原因。我们原本就无法从依附主义中脱离掉这种感觉，使我们的感情活动移动得很慢，更使我们一直不敢打破“爱要逾恒”的神话。在我们的感情世界中，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变心”，那是一种对依附性的背叛，感情的双方都可能受到伤害。尽管“变心”的事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发生，我们依然将它视为不正常的情况，无法产生另一种新的观点来诠释它，或者我们惧于分离与变化，使我们不敢很肯定地把“变心”转变为较正面的诠释。

中国人的熟悉系统

——保守、安定的心理

努力去安排一套熟悉系统是多数农民社会的特征。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的经营之后，创立了村落部族的熟悉系统，使我们更安适地生活。

熟悉系统是一套心理的感受，不仅是以亲族的关系連結成熟悉和合的网络，也以地理的相亲和，进行长久而稳定的交往，使我们不必冒险地接触任何陌生的事物。我们对安全感的需求，往往表现在整体的生活形态——我们重视不需太多变化的家居工作生活；我们缓慢地把朋友围成圈子，并加以固定；我们的异性交往强调日久生情的培养，排斥强烈的激情；我们以互相体谅的心情对待朋友，但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相处；我们喜欢做一些已知规则的事物，对不确定的事物予以忽视或逃避；冒险会引起我们惊慌害怕，必须找朋友一起下水。

当我们必须从熟悉系统走出去，试探地接触陌生系统时，我们习惯地要找熟人介绍；我们会把径自找上门的陌生人视为唐突，并且往往拒绝给予人情。

我们一直希望自己很快地能变成“老手”。在我们的系统里，老经验者被视为较具能力的人，因为他能很快地处理熟悉的事物；对于较创新而必须承受可能失败的作为，往往会遭受到多数人的否决。

在这系统之下，我们发展一套很完美的防弊制度，任何组织、机构的运作必须在完美的防弊措施的保护之下，人们才觉得有安全感——这本是人性很自然的事，可是我们却因而失去了创新的机会。变革，尤其是基本概念的变革，是相当缓慢的。例如，中国人的忠君概念迄今仍然相当坚定，对民主的概念往往仅止于表层的语言；我们的舆论仍然骇异着离婚、堕胎的存在，并且为之忧心忡忡。

中国人行动的积极性也受到熟悉系统的笼罩。我们可以在熟悉系统中很迅速做决策与行动，但对陌生情况的行为却显示认知的萎缩与迟疑，给人一种不够敏锐、坚定的感觉。我们对于未知事物过度的惧怕，而鲜少有着揭开谜底的兴奋，因此，我们必须让自己在原地停留稍长的时间，然后在情势的压力下，半推半就地进行。

于是，我们就不难说明我们社会现象的不易性——我们有着屹立不摇的升学主义，我们有着缺乏弹性的制度，我们有着不移的积习，如脏的厨房、缺乏公德的社会行为与人情关系。

故事的丕变

上述的说明，仅仅把中国人的心理原型加以概说，并不见得反映比较现代化的中国风貌。以台湾的社会来说，台北市已逐渐成为新型文化的实验场，许多新生的事物，经由许多接触西方文化的传送者加以传输，而加速了中国人的心理革命。

台北的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传播个人主义的思维与行动方针，他们不约而同地把个人的自我视为生命的瑰宝，强调自我的坚定有力，并且企图从行动加以履践。消费者运动、主妇运动与抗议行动，都显示出个体自我的凸显。年老者也开始尊重年轻人的创造力，也比较少加以干涉，并愿意乐观其成。

自我的显现，正反映中国人理解事物的方式有所变异。台北地区的中国人开始以较真实的自我为起点，知道许多事物必须自己做决定，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外在的环境因素，因此，依附的心情逐渐地蜕退，代之的是较独立自主的行为模式。

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也正逐渐取代整体性的思考，许多企业体、学术机构的分析性思维，借着制度的分化而灌到民间人心，使台北的土俗行为不再占据优势地位。

然而，在如此的变迁之下，却使传统心态的中国人受到压制之苦，传统心态者发现，他们的对手不再玩约定俗成的社会法则时，往往使他们感到进退失据。最明显的是年轻人对待父母师长的态度，当年轻人要求自主时，对父

母师长而言，即意味着“分离独立”的宣言，使他们对年轻人不再遵守“和合”的法则，或愤怒或无奈。当传统心态者感到时光不再倒流，整个都市文化的气团正朝他们相反的方向离去时，他们感到迷惑与不解。而随后而来的是某种压迫的感觉，逼使他们也要移动脚步，走向他们前半生所未曾思及的路。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国人的原型风貌。许多留学国外的中国人，在他们返国之后，仍然感受到逆文化的震惊，他们看不惯许多中国人的事物，对变迁的中国社会依然感受到中国人的原型力量。从这种现象来看，我国的社会显然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翻版，而是进行中西综合的成长，显示出中国社会会朝向某种自主性的方式走去。

但是，中国人将如何继续编织其心理网络，则是个有待观察的事。我们怀着欣喜、好奇与关爱的心情，看着我们如何继续完成中国人的故事。

DH22/14

目 录

序 中国人心底的故事 余德慧 (1)

一、中国人的“黏” 王幼玲 等 (1)

我们访问了将近30个人，试图从他们身上探索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亲子关系、自己人和外人，以及人情、面子等问题。

寻找盛开的自己

——中国人的自我概念

儿孙自有儿孙福

——中国人的代间关系

内外有别，岂可不分

——“自己人”和“外人”的人际运作

人情绳索，面子功夫

——中国人的权谋之道

忍者是最后的胜利者

——人情面子之外的功夫

隔绝人情的孤独客

——没有人情包袱和人际亲密的人

二、中国人的情面焦虑 余德慧 古碧玲 (55)

中国人爱面子怕丢脸，由这一套“议论系统”引发的社会焦虑潜藏在每个人的心底，当个人言行触犯社会法则时，就会不自觉地冒出来。

情爱的焦虑

——爱要爱在心坎里

性焦虑

——只能做不能说

地位焦虑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暴露缺点的焦虑

——不敢让你知道我是谁

表现的焦虑

——不能让人看笑话

三、战胜自己内心的敌人 庄慧秋 (94)

——剖析害怕权威的心理因素

中国人潜藏着相当强烈的权威性人格。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喜欢排列出上下的等级关系，并习惯地对居于上位的长者，付出尊重与服从。

四、不沉默的勇气 庄慧秋 (104)

为了表面的和谐，为了人情面子，我们总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事情真的过去了吗？我们期待属于这个社会的声音响起。